

Where 东方主战场

Who 抗战中的企业家

南京：新常态下的经济“反击战”

■ 本报记者 李霖轶

正值暑热，走在南京的大街上，抬眼可见的法国梧桐树，给人们带来丝丝凉意。这些“法梧”大多种植于上世纪中期，属于南京的文化遗产，为保护市内的这些树，南京人曾一度发起绿丝带活动。他们注重对家园的保护，注重保护这座城市的历史血脉，包括一些遭日本侵略者践踏的残垣断壁，是为了更清晰、更果敢地面向未来。

八年抗战，曾让南京受尽屈辱、承受屠城之痛。“磨难”是贴给这座城市的标签。

屠城之痛

1937年12月1日，日军攻占江阴要塞；是日，日本参谋本部据松井石根的要求，下达大陆令第八号：“华中方面军司令官须与海军协同，攻占敌国首都南京。”

9日，日军进抵南京城下，并用飞机向城中投撒日“华中方面军”司令官松井石根致中国守军的最后通牒，进行劝降。10日，日军发起总攻，日军见中国军队拒绝投降，遂向雨花台、通济门、光华门、紫金山第3峰等阵地发起全面进攻，战况较9日更为激烈。11日，日军第16师团猛攻紫金山南北的中国军队阵地。12月12日，从拂晓开始，日军飞机大炮密集向各城门集中轰炸，城墙四周房屋倒塌，城墙洞开。战至中午12点，雨花台被日军占领，紫金山第二峰沦陷，中华门和中山门被日军突破。成千成百的中国士兵在没有长官指挥的情况下，用自己的身躯阻挡敌人。12日凌晨2时许，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下达突围、撤退命令，中国军队的抵抗就此瓦解。当时大批逃难居民与溃退的散兵拥挤在街道上，城中秩序开始陷于混乱。

12月13日拂晓，日军山田支队未经战斗即占领了乌龙山；日海军舰艇通过封锁线到达下关江面，日军第16师团一部亦乘舟艇进至八卦洲附近江面。大量正在渡江的中国军队官兵被日海军及第16师团的火力和舰艇的冲撞所杀伤。唐生智撤退后，由萧山令代理国家宪兵司令一职，指挥未渡兵，辗转冲杀，终以弹尽援绝，力竭阵亡，以自己的义举，实现了“誓与南京共存亡”的诺言。

日军攻陷南京之后，在南京城区及郊区对平民和战俘进行的长达6个星期的大规模屠杀、抢掠、强奸等战争罪行。

1945年9月9日上午9时，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典礼在南京中国陆军总部大礼堂(现南京军区大礼堂)举行。在这场意义重大的

仪式上，来自中国、美国、英国、法国、加拿大、荷兰、澳大利亚、苏联等国的军官、新闻及摄影记者共400余人参加了受降仪式，包括同盟国家代表47人。日本投降代表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。

这意味着，中国战区日军投降典礼的举行，正式宣告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，这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战区的胜利。

经济“反击战”

战火逐渐平息，战争给这座城市带来的创伤，犹如一把悬在头上达摩克利斯之剑，告诫人们：落后就会挨打！

事实上，战后南京在发展地方经济方面表现出强劲的“反弹力”，园区建设就是其中的亮点之一。

“江苏软件产业在2012年的生产总值是4100亿元，2013年是5180亿元，2014年便达到6400亿元，经过认证的软件企业也达到5000—6000家。”江苏软件园相关负责人告诉《中国企业报》记者，江苏软件园注册企业最多的时候达到了800家，包括现在很多知名的大企业、地方大型软件企业，都曾在发展初期享受了江苏省的软件优惠政策。

据介绍，2000年的时候，适逢江苏省南京市调整产业结构，从80—90年代的电子、化工、纺织三大顶梁柱产业转型到相对低能耗、低污染的软件行业。按照江苏省软件产业股份公司总经理办主任施琦的描述，江苏软件园是江苏省委的“试验田”，得益于软件行业的发展前景和政策优惠，这个第一个吃螃蟹的园区早期的发展还算顺利，“当时我们是租赁南京熊猫集团的厂房，以此作为物理载体，当时只要在江苏软件园注册，还可以在园外办公经营，同样享受政策优惠”。

在初创发展阶段，江苏软件园成为了江苏省软件企业的黄埔军校，用今天的话说，江苏的软件大企业大多是江苏软件园“孵化”出来的。对此，施琦很自豪。

江苏软件园目前拥有多个园区基地，每个基地都有所定位，徐庄基地定位为中小软件企业孵化基地和科技成果转化实验基地、国内外知名的企业研发中心及总部基地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定位为大中型软件企业聚集的产业基地、软件外包服务出口的吉山基地以及以研发为主、商务配套的生态型、花园式园区的天目湖基地。

各基地的建设，都在按照各自的定位紧密推进。比如其中的徐庄基地，占地面积266

亩，总建筑面积约17.2万平方米，徐庄基地的建设已基本完成。截至2014年底，徐庄基地已累计引入企业61家，包括苏宁电器、途牛网等“巨头”企业，入驻企业2014年度产值突破35亿元。吉山基地累计引入企业35家企业，入驻企业2014年度产值突破18亿元。江苏软件园的产值在整个江苏软件行业排名可以说是名列前茅。

转型重头戏

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，转型升级成了每一个产业园不可忽视的问题。江苏软件园的转型方向之一便是孵化器。

“江苏软件园已成立孵化器子公司，江苏省的孵化器非常多，我们便开始思索能不能建立一个平台去实现产业的集聚，面向全国甚至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。”施琦告诉《中国企业报》记者。

江苏软件园在孵化器方面的布局是一盘大棋。“江苏虚拟软件园”便是这盘棋的利器，江苏虚拟软件园基本囊括整个江苏省的孵化器，形成了以中国(南京)软件谷服务基地与江苏软件园服务基地为核心、辐射江苏11个地市、21个软件园区的江苏软件产业公共服务体系。目前已建成了SaaS服务平台、测试服务平台、人才服务平台、外包服务平台、信息安全服务平台、工业设计服务平台、船舶应用服务平台、云应用服务平台、物联网服务平台等专业服务平台。

“平台”是江苏虚拟软件园的现阶段目标。施琦介绍，“不同的孵化器可以有不同的发展方向，现在的孵化器都是各自为政，我们可以提供这样一个平台，去不同的城市去发展、合作，一个平台比一个孵化器更具有能力和话语权。”

施琦所提到的话语权大意是众人拾柴火焰高，但又不仅仅如此，对此，他解释：“我们现在在做的有些类似于携程早期的模式，把众多孵化器聚集到一个平台上，我们可能会为优秀项目建立产业投资基金，我们甚至可以投资，从长远来讲，甚至可以做‘巨孵’空间城市综合体。”

从目前的发展来看，江苏软件园在利用江苏虚拟软件园进行前期的布局，这为后期的规划提供了足够坚实的基础，上述负责人告诉《中国企业报》记者，“南京的经济总值能够占到全国的十分之一，软件收入是全国的六分之一。”

在新常态经济下，南京的经济“反击战”并不轰轰烈烈，但经济发展数值的不断突破总是令人充满期待。

虞洽卿：我更是一个中国人

■ 晋珀 郭健 薛怡然

1932年日本发动了“一·二八”事变之后，侵略者的铁蹄便踏进了中国的经济中心——上海。自此以后，上海各阶层人民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，资产阶级在此运动中充当了先锋。虞洽卿(1867—1945年)，中国近代航运业巨子，上海市商会会长、宁波同乡会会长，也积极投入到了抗日救亡的潮流中。他组织了各种救亡组织，筹集捐款，支援抗战，救济难民，铲除汉奸。他拒绝日军的拉拢，维护了自己的民族尊严，为中国的抗日救亡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。

实业救国图存

耳听着隆隆的炮火，眼看着熊熊的火焰，上海受到了日军的蹂躏。在此情景下，虞洽卿召集上海实业界、银行界等领袖人物成立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大会(后改名为上海地方协会)，为日后的抗日救亡运动做起到了领军的作用。

1937年“八·一三”事变爆发后，上海出现大量的伤兵，需要大量的救护资金。虞洽卿得此消息后，随即以上海维持大会的名义，呼吁各界仁人志士为支持抗战和救助伤兵募捐善款，虞洽卿自己也毫不吝啬的积极募捐。他还亲自探望伤兵，看到伤兵牺牲自己，保家卫国的民族精神甚是感动。此次呼吁得到了积极响应，最后上海维持大会共募捐慰劳将士款7300.85万元，慰劳伤病费1785万元，捐献慰劳物资无数。

战争造成的另一个问题就是难民问题，在日军的不断轰炸下，大量的老百姓纷纷逃到租界避难，租界内一时人满为患。难民的急剧增加导致了上海这一座“孤岛”粮食短缺的问题日渐严重。为救济难民和解决粮食短缺的问题，1938年10月18日虞洽卿成立了上海难民救济协会，以难民居住、衣服、给养、医药、教育及粮食救济为协会宗旨。为了使更多的难民得到救济，切实得到帮助，必须筹备更多的款项，于是虞洽卿以上海难民救济协会的名义公告各界，认为“救难如救火，积少可成多，人行善之机会，即人人救难之职责，凡我同胞当能兴襄此举也”。同时虞洽卿还利用自己的航运公司(三北轮船公司)，从西贡、仰光(均属越南)运来平粟米，已解决这座“孤岛”的粮食短缺问题。虞洽卿在运粮的途中屡次遭到日军的威胁甚至炮火的袭击，但是侵略者的猖狂气焰并没有打消虞洽卿救国救民的信念，反而激发了他抗击外来侵略者的意志。虞洽卿在救济难民和运输粮食的同时，还不断地捐献军需物品支持前线抗战，帮助抗战人员辗转内地。虞洽卿不仅对上海做出了贡献，更对支持内地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。

自沉海轮抗日舰

除参加抗日救亡组织外，虞洽卿自己的轮船公司也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牺牲。

在抗战前夕，虞洽卿的轮船公司共有轮船65艘9万余吨，占当时全国轮船总吨位的13%以上。抗战时，中国军方为阻止敌军从沿江航道进犯，号召轮船公司无条件的贡献轮船，封锁长江航道。

军方发出号召后，虞洽卿带头积极响应，他捐出多艘海轮、有3万吨载石自沉于江阴(现属于无锡市江阴市)要塞口，以此阻止日舰进犯。此后，三北公司的9万余吨轮船中，还有有2万吨滞留宜昌，即不能进川江三峡，又因江阴封锁退不回长江下游，留在上海的只有4万吨轮船了。

拒绝日军利诱

虞洽卿是上海名人，如果得到他的支持，日军在上海的统治将会稳固的多。因此日军占领上海后，虞洽卿就成了日军多方拉拢的对象。

日军为策反虞洽卿，他们在经济和政治上多方施加压力，迫使虞洽卿与其合作。1937年8月，虞洽卿在运送难民的途中，在上海海关外被阻，日方趁机提出，要以“参加国民政府之和平运动”为条件，遭到了虞洽卿的拒绝。但是日方并不死心，1937年12月日本军方在上海组织成立了“大道市政府”诱惑虞洽卿当“市长”，专门派代表到上海找虞洽卿洽谈，虞洽卿当场予以拒绝。虞洽卿回言道：我虽然是一个商人，看中的是商人的利益，但是我更是一个中国人！

1938年8月日本海军也公开出面，对虞洽卿施加压力，要求虞洽卿经营的三北公司加入由日伪控制的船舶联合局，为“中日经济提携”效力，这样三北公司“可以确实的得到海军的保护”。虞洽卿予以拒绝，并回称：“盖在此中日不幸事件中，按环境事实，殊难共同海运事业，况且三北公司现在并无轮船可资运用。”

虞洽卿义正词严拒绝日本人，却加入了由中共江苏省“联委”领导发起举办的“物品慈善义卖会”。随着上海形势的不断恶化和沦陷，1941年春，虞洽卿悄然离开上海赴重庆，继续他的抗日救亡生涯。

虞洽卿1945年4月26日在重庆病逝，蒋介石亲自为其故居题写匾额：“输财报国”。

(作者单位：北京国力基柱企业文化交流中心)

When 八年抗战:被毁坏的中国经济之六

1931

汪伪政府配合日本卖国

1935

1939

1940

1943

1945

从1931年大规模开始的日本侵华战争，随着战火烧向内地，那些不得不内迁的企业，内迁后对中国西部省份的经济产生了很深的影响。1935年前，内地省份是与世隔绝的，但战争最终改变了这一切——在日本人被打跑后，很多企业留在当地，很多工人成了未来的

工人阶级的一员。

这时，蒋介石的亲密战友汪精卫开始选择另外的道路。汪精卫于1939年5月正式投靠日本，成立了伪国民政府。但仅从地域覆盖上来看，这个时期汪精卫采取的经济措施，更直观地影响着当时中国的经济走向。

1943年2月12日，改组后的汪伪全国经济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，通过了《战时经济政策纲领》，企图统一货币发行权，强化中央储备银行，以确保金融对其它经济部门的支配。但是由于汪伪政府实施的是配合日本大东亚战争的卖国政策，其财政赤字愈来愈大。

愈大。

为了弥补赤字，汪伪只好借助于滥发纸币。1943年4月军票停发后，中储券发行量迅速膨胀，至1945年8月，其发行额已达41993亿元。通货数量的剧增，引起物价不断上涨，进而刺激通货更加膨胀。这种恶性循环使汪伪经济陷于崩溃的境地。

而在边远的陕西，毛泽东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开始了政经一体化试验：1940年开始建立的“三三制”政权，实行减租减息，开展大生产运动和经济文化建设，开展武装斗争。共产党最终获得了成功。



日军炮弹轰炸南京城墙